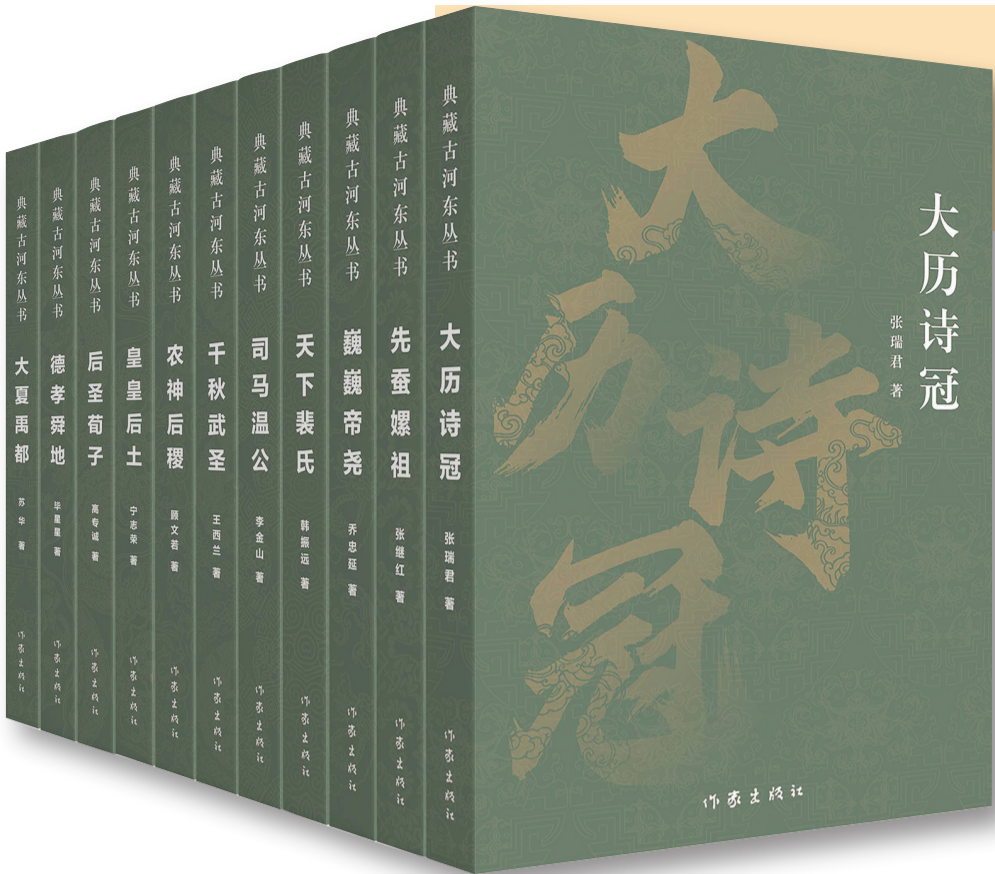


挖掘河东文化内涵,弘扬民族文化自信

——“典藏古河东丛书”序

□张平



运城位于黄河之东,又称“河东”。河东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数千年来,大河滔滔,汹涌奔腾,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杰辈出,群星灿烂,孕育了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具有厚重的人文历史积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不愧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关于“河东”的说法,最早来源于《尚书·禹贡》的记载。《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首先是冀州,其次分别为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皆以冀州为中心。冀州即古代所谓的“河东”,当时的河东是华夏文明的轴心地带。河东在战国、秦汉时指今山西西南部,后泛指今山西省,因黄河经此由北向南流,这一带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战国中期,秦国夺取魏国的西河和韩国的上党以后,魏国为加强防守,遂置河东郡,国都在今运城城市安邑镇。公元前290年,秦昭王在兼并战争中迫使魏国献出河东地四百里给秦。秦沿袭魏河东郡旧名不变,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秦始皇统一六国,设三十六郡,运城属河东郡,治所安邑。汉代的河东辖今山西阳城、沁水、浮山以西,永和、隰县、霍州市以南地区。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河东郡移治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辖境缩小至今山西西南汾河下游至王屋山以西一角。隋唐,寻复置。唐改河东郡为蒲州,复改为河中府。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蒲州为河东郡。宋为河东路,辖山西大部、河北及河南部分地区,至金朝未变。元、明、清与临汾同为平阳府,治所平阳(今临汾尧都区)。民国3年至19年,运城、临汾及石楼、灵石、交口同属河东道。由于河东古时位于两大名都长安和洛阳之间,其他州郡对其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因此河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河东所辖的地区范围不断发生变化,但其疆界基本上以现代的山西运城城市为中心。今天的河东地区,特指山西运城城市。

河东位于山西西南部,是中国两河交汇的风水佳地。黄河滔滔,流金溢银,纵横晋陕峡谷;汾水漫漫,飞珠溅玉,沃育河东厚土。在今天之运城,黄河从天津寺塔西侧入境,沿秦晋峡谷自北向南,出禹门口后一泻千里,由北向南经天津、万荣、临猗、永济,在芮城县的风陵渡曲折向东,过平陆、夏县,到垣曲县的碾盘沟出境,共流经运城城市八个县(市)。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发源于宁夏管涔山,从南至北流经河东大地。汾河自新绛县南梁村入境,经东乡、稷山、天津、万荣四个县(市),由万荣县庙前乡入黄河,灌溉河东万顷良

田。华夏民族的始祖在河东繁衍生息,《诗经》里的许多诗篇都歌吟过河东大地。黄河和汾河的交汇之处,山西省运城城市,吮吸黄河和汾河两大母亲河的乳汁,滋生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在朝代的兴替与岁月的更迭中,多少华夏儿女在河东大地描绘了动人画卷,道尽多少人生的沧桑变化!

河东地处晋、豫、陕交会的金三角地区。山西省运城城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陕西省渭南市,区域总面积约5200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700余万,共同形成了晋陕豫三省边缘的“黄河金三角区域”,构成了以运城城市为核心的文化经济圈。这个区域位于我国中西部交界地带,接通华北,连接西北,笼罩中原,位置优越,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而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作用。该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旅游优势、经济协作,可以发挥重要的经济文化互相促进的平台效应,具有“以东带西、东中共同发展”的战略价值。研究河东历史文化,对于繁荣黄河金三角地区的文化、打造区域经济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河东是“古中国”的发祥地。河东地区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区域之一,这片美丽富饶的大地,远古时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脉起伏、河网纵横,绿草丰茂、森林覆盖、飞鸟鸣啾、走兽徜徉,是人类栖息的理想地。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其《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指出:“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今天,从远古文明到石器时代,从类人猿到原始人、智人的进化,河东这块土地都充当了亲历者和见证者。

人类的远祖起源于河东。1995年5月,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世界上最早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猿类化石,命名为“世纪曙猿”,它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以前,比非洲古猿早了1000多万年。中美科学家在英国权威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联合发表论文,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山西垣曲县寨里村,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

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燃烧于河东。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石器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动物化石有巨颅石、山西披毛犀、中国

野牛、晋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猪、纳玛象等,尤其在文化层中发现了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烧骨,这是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证明远在243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活居住,并已经掌握了“火种”。

中国的蚕桑起源于河东。《史记》记载了“嫫祖始蚕”的故事,河东地区有“黄帝正妃嫫祖养蚕缂丝”的传说。西阴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西阴村,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该处遗址,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西北倚鸣条岗,南临青龙河,面积约30万平方米。此处发掘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骨器,最具震撼力的是发现了半枚经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壳,这为嫫祖养蚕的传说提供了有力实证。2020年,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了仰韶文化早期遗物,主要有罐、盆、钵、瓶等,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四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西阴遗址和师村遗址互相印证,意味着迟至距今6000年以前,河东的先民们就掌握了养蚕缂丝的技术。

远古时代,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部落生活在河东一带。黄帝的元妃嫫祖是河东地区夏县人,宰相风后是河东地区芮城县风陵渡人,黄帝和蚩尤大战于河东地区的盐池一带。传说黄帝取得胜利后尸解蚩尤,蚩尤的鲜血流入河东盐池,化为卤水,因而这里被命名为“解州”,今天运城城市还保存着“解州镇”的地名。盐池附近有个村庄叫蚩尤村,相传是当年蚩尤葬身的地方。后来人们将蚩尤村改名为“从善村”,寓弃恶从善之意。黄帝战胜蚩尤之后,被各诸侯推举为华夏族部落首领。《文献通考》道:“建邦国,先后后土。”黄帝经过长期战争后,希望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得到大地之神后土的护佑,于是黄帝带领部落首领来到汾阴脍上,扫地为坛,祭祀后土,传为千古佳话。明代嘉靖版《山西通志》记载:“轩辕扫地坛在后土祠上,相传轩辕祭后土于汾脍之上。”

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尧、舜、禹定都的地方。文献记载:“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据史料记载,尧帝的都城起初设在蒲坂,后来迁至平阳。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永济县志》记载:“尧旧都在蒲。”《水经注》:“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曰尧城。”《阙里志》:“蒲坂,尧都。”如今运城永济市(蒲坂)遗存有尧王台,是当年尧舜实行“禅让制”的见证地。舜亦建都于蒲坂,史籍记载,舜生于诸冯,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都于蒲坂。远古时期,天地茫茫,人民饱受水灾之苦,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禹吸取教训,从冀州开始踏遍九州,改“堵”为“疏”,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最终治水成功。《庄子·天下》记载:“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治水有功,舜把天子之位禅让给禹。禹建都安邑,其遗址在山西夏县的禹王城。《括地志》道:“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禹王城遗址出土了东周至汉代的许多文物,其中有“海内皆臣,岁丰登熟,道无饥人”十二字篆书。从尧舜禹开始,河东便是帝王的建都之地。

运城盐池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食盐产地,被田汉先生赞为“千古中条一池雪”,它南倚中条,北靠峨嵋,东邻夏县,西接解州,总面积132平方公里。盐湖烟波浩渺,硝田纵横交织,与美国犹他州澳格丁盐湖、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库楚克盐湖并称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运城盐池发现并食用盐。《汉书·地理志》:“河东,地平水浅,有盐铁之饶,唐尧之所都也。”黄河和汾河两河交汇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植被和盐业资源,为古人类提供了良

好的生活条件。当年舜帝曾在盐湖之畔抚五弦之琴,吟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运城在春秋时称“盐邑”,汉代称“司盐城”,宋元时名为“运司城”“凤凰城”等。因盐运而设城,中国仅此一处。河东人民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五步法”产盐工艺,是全世界最早的产盐工艺,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活化石”。

万荣县后土祠是中华祠庙之祖。后土祠位于山西万荣县庙前镇,《水经注》记载,河东汾阴“有长阜,背汾带河,长四里,广二里有奇,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孔尚任总纂《蒲州府志》记载:“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尧帝和舜帝时期,确定八个官员专管后土祭祀,夏商周三朝的国家每年在汾阴举行祭祀后土仪式。汉武帝在汾阴建立后土祠,写下传诵千古的《秋风辞》。从汉、南北朝、隋、唐、宋至元代,先后有八位皇帝亲到万荣祭祀后土,六位皇帝派大臣祭祀后土。万荣后土祠堪称轩辕黄帝之坛、社稷江山之源、中华祠庙之祖、礼乐文明之本、黄河文化之魂、北京天坛之端。

河东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河东地处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远古时代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自然地理环境。舜耕历山,禹凿龙门,嫫祖养蚕,后稷稼穡,这些历史传说都发生在河东大地。《晋书·天文志上》:“稷,农正也,取乎百谷之长以为号也。”后稷是管理农业的长官、百谷之长。《孟子》:“后稷教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意思是后稷教民从事农业,种植五谷,五谷丰收,人民得到养育。传说后稷在稷山麓(在今山西稷山县境)教民稼穡,播种五谷,是远古时代最善种稷和粟的人,被称为“稷王”。人们把横跨万荣、稷山、闻喜、运城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山脉叫作“稷王山”。迄今为止,在河东已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四百余处,出土的农耕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锄、石铲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收割工具有半月形石刀、石镰、骨铲、蚌镰等。万荣县保存有创建于北宋时期的稷王庙,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宋代庑殿顶建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孕育了无数杰出人物,史册的每一页都有河东的亮丽身影。荀子,名况,战国晚期赵国郟邑(故地在山西临猗、安泽和新绛一带)人,属于河东人。他一生辉煌,兼容儒法思想;贡献杰出,塑形三晋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先秦两汉之际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开启了新型的大一统时代。荀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提出儒法融合,把道德修身、道德教化、道德约束之政治结合在一起,强调以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仁义之道治理天下,主张思想统一、制度统一,对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从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荀子是中国古代最有贡献的思想家之一。

关羽,东汉末年名将,被后世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三国志·蜀书》道:“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东汉末年朝廷昏弱,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在兵燹战火中煎熬挣扎。时天下大乱,各种政治势力分合不定,各个阵营的人物徘徊左右,选择刘备,就是选择了艰难的人生道路;忠于汉室,就意味着奋斗和牺牲。关羽一生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报国以忠,为民以仁,待人以义,交友以诚,处事以信,对敌以勇,俯仰不愧于天,精诚可悯于苍生。关羽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义孝悌仁爱诚信。古时以民众对公

的普遍敬仰为基础,以朝廷褒封建庙祭祀为推动,以各种艺术传播为手段,以历史长度和地域广度为经纬,产生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和民族道德伦理的关公文化。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人,唐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历官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检校户部郎中等,唐代杰出诗人。明王士禛《分甘余话》道:“卢纶,大历十才子之冠冕。”卢纶存诗339首,是处于盛唐到中唐社会动乱时代的诗人。他的《送绛州郭参军》,至今读来,仍有慷慨之气:“炎天故绛路,千里麦花香。董泽雷声发,汾桥水气凉……”卢纶无疑是大历时期最具独特境界的诗人,他的骨子里流淌着盛唐的血液,积极向上,不屈不挠,关心社会民生,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都在努力创作诗歌。卢纶的诗歌气魄宏伟,境界广阔,善用概括的意象描绘盛唐风韵,其贡献与孟郊、贾岛等相比丝毫不弱,不仅在大历时期,在整个唐代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他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北宋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政期间,提出“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的治国理念,加强道德教育,改变社会风气;严格选用人才,严明社会法治;倡导“轻租税,薄赋敛,已逼责”的民本思想,希望实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他主持编纂中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300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资治通鉴》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河东历史上的许多大家族,代有人杰,长盛不衰。河东的名门望族主要有裴氏家族、薛氏家族、王氏家族、柳氏家族、司马家族等。闻喜县裴氏家族为世瞩目,被誉为“宰相世家”。裴氏自汉魏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是其最兴盛时期。据《裴谱·官爵》载,裴氏家族在正史立传者600余人,大小官员3000余人;有宰相59人,大将有59人,尚书55人。比较著名的有西晋地理学家裴秀,撰《禹贡地域图序》,提出编绘地图的“制图六体”;西晋思想家裴頠,著有《崇有论》;东晋裴启的《语林》,是我国最早一部志人小说;南北朝时的裴松之、裴骃(松之子)、裴子野(裴骃孙),被称为“史学三家”;唐代名相裴度,平息藩镇叛乱,功勋卓越,被称为“中兴宰相”。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裴氏列为天下第一家族,感叹“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堪称中华民族的源头和根基。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各位作者力求基于严谨的学术性、臻于过程的生动性,以史料和考古为基础,以学术界的共识为依据,不作歧义性研究和学术考辨,采用文化散文体裁,用清朗健康、流畅明丽的语言,梳理河东历史文化的渊源和脉络,挖掘河东文化的深厚内涵,探寻其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弘扬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读者更加认识和了解河东历史文化,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与感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自《典藏古河东丛书》,作家出版社,2022年8月)

《九诗人》:这样仰望俄罗斯诗人

□吴玫

相信《九诗人:俄罗斯的太阳与月亮》的作者范行军同我一样,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九故事》的深度“中毒者”,所以才会将自己因仰望俄罗斯诗人而写的一本书定名为《九诗人》。塞林格的《九故事》非常实相,收录的就是他创作的九个故事,那么两次行走俄罗斯的作者,在三万多公里的行程中,是否真如他《九诗人》所记录的那样,只遇见了九位诗人?作为他第一次俄罗斯之行的旅伴,我更愿意相信,《九诗人》中的“九”与《九故事》中的“九”恰好站在了虚实两端。假如说塞林格的“九”是实相的话,那么范行军新书书中的“九”,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多。能如此果断地猜测,是因为当我们一起行走在似乎处处隐藏着俄罗斯杰出文化名人的故居或纪念馆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的街头巷尾,不止一次地面对诗人伏案过的书桌时,回望站立在不远处的诗人塑像时、深情注视诗人的手稿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虔诚的拜服。这种情绪犹如暖阳辐射开来,让我这样不怎么喜欢诗的同行者也深受感染,于是我一眼就看出,他在第一次俄罗斯之行的旅途中拜谒过的诗人,没能悉数呈现在他的《九诗人》中。也就是说,作者可能经过艰难的选择,才确定这些诗人具备以点带面的光辉。他们既用诗表达了自己的个性,也用诗代言着俄罗斯。他们的才华和作品,足以向《九诗

人》的读者证明,自普希金以降,俄罗斯是一个盛产杰出诗人的丰饶之地。

那么他们都是谁呢?是普希金、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布罗茨基。

浏览一遍被《九诗人》的作者写进书里的这些世界诗坛史上辉煌的名字,会不会有读者像我一样担忧范行军会步人后尘?九位诗人头上的光环实在耀眼,不知道有多少专业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在被他们的诗作感动后,用多种语言留下了肺腑之言。范行军要在他们之后再度说话,他还还能发前人未有之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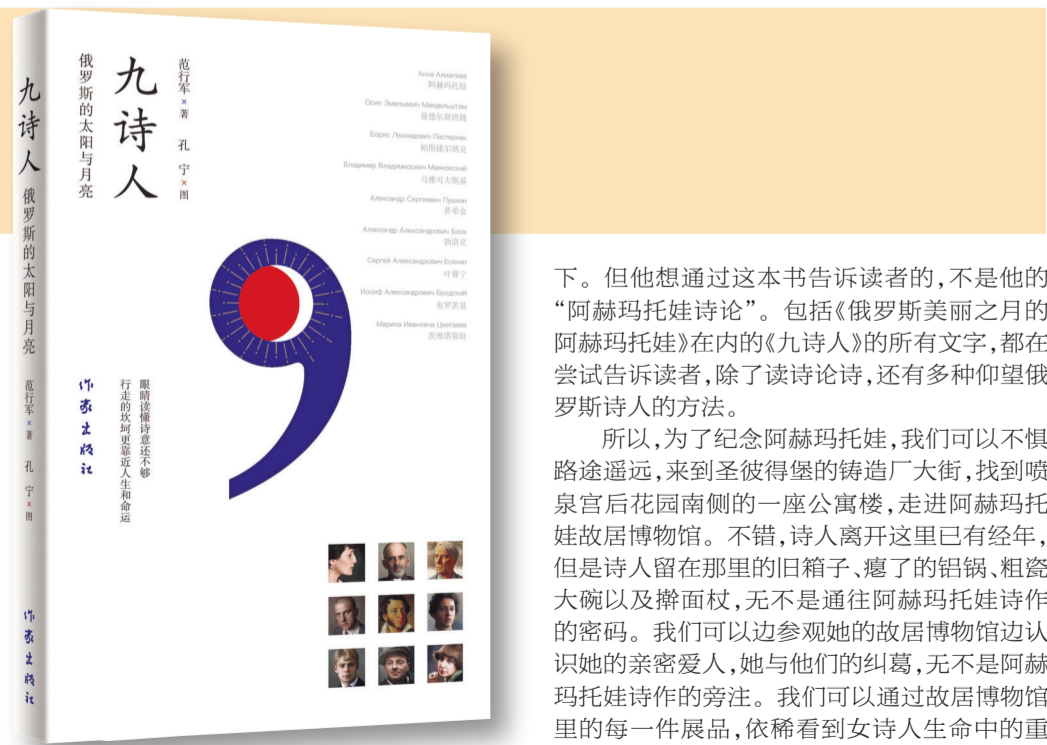
他的亲密好友看得见,为了这本《九诗人》,范行军使出了什么样的“蛮力”。第一次俄罗斯之行以后,他已经拥有足够素材来写作一本关于俄罗斯诗人的书,但他死死扼住了写作的冲动,等到下一次远游结束后,才开始捡拾起写作的念头。也就是说,《九诗人》的写作计划大约始于2018年秋天。既然如此,这本书何以要到2022年年末才与我们见面?如果说范行军为了《九诗人》曾使出过蛮力,那么蛮力过后,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积蓄能量,才能与九位诗人一一对话。

只有他的亲密好友才清楚,为了这本《九诗人》,范行军爬梳了多少史料,阅读了多少本诗人传记、查找了多少与诗人相关的轶事。至于

九位诗人的作品,在多种译本中揣摩个中最佳,更是过去4年中范行军的日常生活之一。如此充分的准备工作,注定了《九诗人》会是一本表里如一的读诗札记。九诗人何以成为九诗人的推演过程是扎实的,与之相得益彰的,是华美的文字和灵动的文本。

阿赫玛托娃,因为她的美貌,因为她不屈服,因为她用实际行动做出的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别解,已成为世界诗歌史上永恒的话题女王。以阿赫玛托娃为主角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范行军还怎么状写他的阿赫玛托娃?

《俄罗斯美丽之月的阿赫玛托娃》是《九诗人》中关于阿赫玛托娃篇章的标题,并不见惊艳,因为将阿赫玛托娃比作月亮的写作者难以计数。但若因此将《俄罗斯美丽之月的阿赫玛托娃》视作等闲之篇,怕是要错过注视阿赫玛托娃的新视角。阿赫玛托娃的不朽诗篇当然要品读,但作者用“痛苦是诗人预言到的光荣”“吸引他的并不是相貌而是姿势”和“丢失的黑戒指没有归还她”三个章节描画他的女诗人时,关于阿赫玛托娃诗作的感悟没有出现在文章开端,更没有跨越整篇文章,只在“痛苦是诗人预言到的光荣”一章中占据了几个小节的部分篇幅。是范行军无力解读阿赫玛托娃吗?不,“她悲伤,却不沉沦,更见骨气。文字里所有的冷光,



都经过了痛苦的磨砺。”这句就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之第7首《判决》所抒发的短论,准确而炽烈,尤其那句“文字里所有的冷光,都经过了痛苦的磨砺”,前半句写出了作者读《安魂曲》时的视觉感受和肢体感受,后半句点化出了阿赫玛托娃铸就《安魂曲》所用的“材料”,那是诗人的肉身和灵魂。

可见,哪怕用一整本书告诉读者他在阿赫玛托娃的诗里读到了什么,对范行军也不在话

下。但他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的,不是他的《阿赫玛托娃诗论》。包括《俄罗斯美丽之月的阿赫玛托娃》在内的《九诗人》的所有文字,都在尝试告诉读者,除了读诗论诗,还有多种仰望俄罗斯诗人的方法。

所以,为了纪念阿赫玛托娃,我们可以不惧路途遥远,来到圣彼得堡的铸造厂大街,找到喷泉官后花园南侧的一座公寓楼,走进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不错,诗人离开这里已有经年,但是诗人留在那里的旧箱子、瘪了的铝锅、粗瓷大碗以及擗面杖,无不是通往阿赫玛托娃诗作的密码。我们可以边参观她的故居博物馆边认识她的亲密爱人,她与他们的纠葛,无不是阿赫玛托娃诗作的旁注。我们可以通过故居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展品,依稀看到女诗人生命中的重要片段,比如与以赛亚·伯林的那一次著名又意义非凡的会晤……

那不就是一本文化游记吗?不是。两次行走俄罗斯,三万多公里行程,以此为素材,赋予所见之景以文化内涵,要比写作这本《九诗人》轻省得多。范行军之所以避易就难,是因为他想给出一本别具一格的俄罗斯诗人传奇。他做到了,并给读者留出了足够宽广的阅读空间。既然认定“九”为多之意,我们可否从《九诗人》出发,用更多的方式仰望更多的俄罗斯诗人,而让太阳和月亮总是陪伴着被琐碎搅乱的我们?